



天津人民出版社

十月风云：古巴导弹危机研究

赵学功 著

Tianjin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The Turbulence
of October:
Inside the
Cuban Missile
Crisis.*

十月风云：古巴导弹危机研究

赵学功 著

天津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十月风云:古巴导弹危机研究 / 赵学功著. —天津: 天津人民出版社, 2008. 11

ISBN 978-7-201-06127-6

I. 十… II. 赵… III. 加勒比海危机(1962)—研究
IV. D851. 22 D871. 2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189394 号

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

出版人: 刘晓津

(天津市西康路 35 号 邮政编码:300051)

邮购部电话: (022)23332469

网址: <http://www.tjpebs.com.cn>

电子信箱: tjpebs@126.com

天津新华二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

2009 年 2 月第 1 版 2009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787×1092 毫米 16 开本 30.5 印张 2 插页

字数: 540 千字 印数: 1~3,200

定 价: 58.00 元

前　　言

1962年10月发生的古巴导弹危机是冷战时期美苏两国进行的第一次真正的、直接的核对抗，“在那紧张的几天里，世界徘徊在战争的边缘”。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人类经历的最为严重的一次危机。尽管冷战已经成为历史，苏联也不复存在，国际关系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但是核武器依然存在，人类仍然面临着核战争的威胁。因此，研究这场危机不仅对于理解冷战时期的美苏“危机外交”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而且对于认识和把握当今纷繁复杂的国际关系的发展变化也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古巴导弹危机自结束以来，便成为历史学者和政治学者长期研究的课题，大量有关论著问世。^①在20世纪60年代的研究成果中，大部分美国学者都对肯尼迪政府处理危机的政策给予高度评价，认为肯尼迪的冷静判断使美国在战争和投降之间走出了一条安全的道路，最终摆脱了危机，这既是他事业的顶峰，同时也为以后的决策者树立了一个典范，应该成为学习和借鉴的对象，由此形成了以西奥多·索伦森、小阿瑟·施莱辛格等为代表的所谓“传统学派”，也可称之为“官方学派”，因为这一学派中的不少人都曾是肯尼迪政府时期的官员，他们的观点在很大程度上是为政府的决策作辩护。^②在他们看来，苏联部署在古巴的导弹对美国构成了严重的挑战，是对美苏双方力量均势“突然的、直接的和危险的”改变，肯尼迪总统除了采取有力行动之外没有别的选择，这并不是出于信誉、形象或者国内政治等方面的考虑，完全是因为国家安全的需要，对古巴的隔

^① 可参看 Lester H. Brune, *The Cuba – Caribbean Missile Crisis of October 1962*, Claremont: Rigina Books, 1996; Maria A. Machin, *The Cuban Missile Crisis: An Analysis of a Quarter Century of Historiography*, MA Thesis, Florida Atlantic University, 1990.

^② Richard N. Lebow, “Domestic Politics and the Cuban Missile Crisis: The Traditional and Revisionist Interpretations Reevaluated,” *Diplomatic History*, Vol. 14, No. 4, Fall 1990, pp. 471 – 472; Reachbha FitzGerald, “Historians and the Cuban Missile Crisis: the Evidence – Interpretation Relationship as Seen Through Differing Interpretations of the Crisis Settlement,” *Irish Studies in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 18, 2007, pp. 192 – 193.

离行动是美国的最佳选择，对肯尼迪在危机中的表现给予了高度评价。这派学者对美国的决策过程作了详细的阐述，但对苏联和古巴方面的论述非常薄弱。在早期的有关著作中，最有影响的当属哈佛大学政治学家格雷哈姆·艾利森的《决策的实质：阐释古巴导弹危机》，该书出版于1971年。艾利森通过对古巴导弹危机的个案研究，揭示了美国外交决策的三个模式，即理性行为模式、组织过程模式和官僚政治模式，成为研究外交政策决策过程的一本经典之作。^①此外，阿贝尔的《导弹危机》、帕彻的《冲突：古巴导弹危机与共处》等，也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②

到了20世纪70、80年代，学者们对古巴导弹危机的研究更为深入，对危机爆发的原因、美国政府的决策过程等有了新的认识，由此出现了所谓的“修正学派”，包括斯通、罗纳多·斯蒂尔、理查德·沃尔顿、巴顿·伯恩斯坦、托马斯·帕特森等，开始对肯尼迪的古巴政策及其对导弹危机的处理进行反思，并提出严厉批评。^③不少学者认为，肯尼迪是一个强烈反共的“冷战斗士”，奉行了比艾森豪威尔政府更为强硬的对外政策，这一政策不仅将古巴推向苏联一边，而且直接导致了危机的产生。帕特森认为，肯尼迪并没有简单地继承其前任的古巴政策，而是过分地关注如何促使卡斯特罗下台，为此对古巴施加种种压力。在很大程度上，正是因为美国对古巴的敌视才使得危机发生。肯尼迪不单单从其前任手中接过了古巴问题，并且使它变得更为糟糕。^④伯恩斯坦甚至提出，肯尼迪之外的其他总统完全可能不选择“猪湾入侵”行动，不去寻求针对古巴和卡斯特罗的秘密措施，不会将美国的核力量建设到远远超过苏联规模的程度，也不会在土耳其部署“木星”导弹。他认为，这些行动，尤其是针对卡斯特罗的阴谋和可能采取入侵行动的暗示，促使赫鲁晓夫冒险在古巴部署导弹。^⑤学者们批评说，肯尼迪在发现导弹后，应该秘密地与赫鲁晓夫进行联系，通过外交渠道解决

^① Graham T. Allison, *Essence of Decision: Explaining the Cuban Missile Crisis*, Boston: Little, Brown, 1971.

^② Elie Abel, *The Missile Crisis*, New York: Bantom Books, 1968; Henry Pachter, *Collision Course: The Cuban Missile Crisis and Coexistence*, New York: Praeger, 1963.

^③ Fitzgerald, "Historians and the Cuban Missile Crisis," pp.194 - 196.

^④ Richard Walton, *Cold War and Counterrevolution: The Foreign Policy of John F. Kennedy*, Baltimore: Penguin Books, 1972, pp.58 - 59; Thomas Paterson, *Kennedy's Quest for Victory: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9, p. 129; Paterson, "The Defense of Cuba Theme and the Missile Crisis," *Diplomatic History*, Vol. 14, No. 2, Spring 1990, p.256.

^⑤ Lebow, "Domestic Politics and the Cuban Missile Crisis," p. 475; James Nathan, *The Cuban Missile Crisis Revisited*,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92, pp.106 - 107.

冲突,而不应采取公开下最后通牒的方式,从而使得整个世界濒临灾难的边缘,肯尼迪对危机的处理是“极端不负责任和冒险的”。^①另有学者批评肯尼迪把危机看成是对其个人信誉和勇气的挑战,甚至不惜为此冒核战争的危险。“修正派”学者非常重视美国国内政治因素对肯尼迪外交决策的影响。在他们看来,肯尼迪之所以宁愿选择对抗,不惜冒战争风险,迫使赫鲁晓夫在1962年11月国会选举前从古巴撤出导弹,在很大程度上是出于国内政治的考虑。伯恩斯坦强调,肯尼迪及其顾问确信,应该在古巴问题上有所作为,才能使赫鲁晓夫和苏联其他领导人对美国的决心产生深刻印象,公开的对抗、公开的胜利将使国内民众、盟友、苏联人认识到他的果敢和承诺,导弹实际上关系到美国的信誉问题。^②肯尼迪时期出任美国驻印度大使的加尔布雷思也明确指出:国内政治是肯尼迪决定实施封锁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一旦导弹出现在古巴,出于政治上的需要,肯尼迪政府将冒任何风险迫使苏联撤走导弹。^③“修正派”学者对赫鲁晓夫冒着损害自己声誉的危险而撤出导弹给予了高度评价,认为如果赫鲁晓夫拒绝这样做,大概以后也不会有历史学家为肯尼迪唱赞歌了,因为肯尼迪及其顾问为了追求胜利不惜一切代价,整个世界也许会因此而化为灰烬,正是肯尼迪的好战对世界构成了主要威胁,而赫鲁晓夫的谨慎拯救了和平。他们指出,对古巴的封锁是一种不负责任的冒险行为,危机之所以能和平解决归因于苏联的克制和肯尼迪的运气。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新的文献资料的不断涌现,学者们对古巴导弹危机的研究进入了成熟阶段,出现了一些新的特点。首先,研究的深度和广度较前有了大的发展,出版了大量有关论著,提出了一些新观点,对赫鲁晓夫、肯尼迪进行了重新评价,并对古巴在危机中的作用给予了较多重视。^④应该提及的是,艾利森的经典之作《决策的实质》在1999年重新修订再版,补充了不少新

① Walton, *Cold War and Counterrevolution*, pp. 103 – 104, 141 – 142.

② Barton Bernstein, “The Week We Almost Went to War,” *Bulletin of the Atomic Scientists*, Vol. 32, No. 2, February 1976, p. 17.

③ Nathan, *The Cuban Missile Crisis Revisited*, p. 165.

④ Robert Divine, “Alive and Well: The Continuing Cuban Missile Crisis Controversy,” *Diplomatic History*, Vol. 18, No. 4, Fall 1994, pp. 551 – 560; Richard M. Pious, “The Cuban Missile Crisis and the Limits of Crisis Management,” *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 Vol. 116, No. 1, Spring 2001, pp. 81 – 105; Nicola Miller, “The Real Gap in the Cuban Missile Crisis: The Post – Cold War Historiography and the Continued Omission of Cuba,” in Dale Carter and Robin Clifton eds., *War and Cold War in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New York: Palgrave, 2002, pp. 211 – 239; Burton Kaufman, “John F. Kennedy as World Leader: A Perspective on the Literature,” *Diplomatic History*, Vol. 17, No. 3, Summer 1993, pp. 458 – 463.

的文献资料,对一些问题修订了原来的观点,提出了新的阐述。^①

第二,美国、苏联的大量相关文件档案陆续解密、出版,为学者们重新认识这场危机提供了较充分的、宝贵的资料。有学者估计,美国国务院有关古巴导弹危机的文件资料 80% 已经公开,成为冷战时期资料开放程度最高的历史事件之一,同时国家安全委员会、国防部、中央情报局、参谋长联席会议等相关部门的大量文件也相继解密。^②美国国务院历史学家办公室负责编撰的《美国对外关系文件集》古巴导弹危机部分仍然是研究者所依赖的最为重要的资料来源。应当说,就有关美国对古巴政策和古巴导弹危机而言,《美国对外关系文件集》肯尼迪卷的学术水准大为提高,不仅为研究者提供了大量国务院和白宫的有关资料,包括有关会议录音带的文字记录,而且也包含了丰富的国防部、中央情报局、参谋长联席会议等部门的重要文件,使得读者对美国的决策过程有了更为清晰、全面的认识,受到了历史学者的普遍好评。^③1997 年,哈佛大学历史系教授欧内斯特·梅与弗吉尼亚大学教授菲利浦·泽里科合编了《肯尼迪录音带》,汇集了危机期间在内阁会议室和椭圆形办公室召开的 21 次会议的会谈记录,为人们的研究提供了第一手的详细资料。该书出版后受到史学界的广泛关注。^④2001 年,他们又进一步整理了收集的肯尼迪录音资料,编辑出版了 3 卷本

^① Graham T. Allison and Philip Zelikow, *Essence of Decision: Explaining the Cuban Missile Crisis*, New York: Longman, 1999; David Houghton, "Essence of Excision: A Critique of New Version of Essence of Decision," *Security Studies*, Vol. 10, No. 1, Fall 2000; Bruce Kuklick, "Reconsidering the Missile Crisis and Its Interpretation," *Diplomatic History*, Vol. 25, No. 3, Summer 2001; Mark White, "New Scholarship on the Cuban Missile Crisis," *Diplomatic History*, Vol. 20, No. 1, Winter 2002; Barton Bernstein, "Understanding Decisionmaking: U.S. Foreign Policy and the Cuban Missile Crisis," *International Security*, Summer 2000.

^② Nathan, *The Cuban Missile Crisis Revisited*, p.134.

^③ Philip Zelikow, "American Policy and Cuba, 1961 – 1963," *Diplomatic History*, Vol. 24, No. 2, Spring 2000, pp.317 – 318; Raymond L. Garthoff, "Documenting the Cuban Missile Crisis," *Diplomatic History*, Vol. 24, No. 2, Spring 2000, pp.297 – 303.

^④ Ernest R. May and Philip D. Zelikow. *The Kennedy Tapes: Inside the White House during the Cuban Missile Crisis*, Cambridge: 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Mark J. White, "Revisiting the Cuban Missile Crisis," *Diplomatic History*, Vol. 23, No. 3, Summer 1999, pp. 565 – 570. 曾经在肯尼迪总统图书馆工作了 15 年之久的历史学家斯特恩对该书文字记录的准确性提出了质疑,参见 Sheldon M. Stern, "The 1997 Published Transcripts of the JFK Cuban Missile Crisis: Too Good to Be True?" *Presidential Studies Quarterly*, Vol. 30, No. 3, September 2000; "What JFK Really Said," *The Atlantic Monthly*, May 2000. 2003 年,斯特恩自己出版了一本关于古巴导弹危机的著作,即 *Averting The Final Failure: John F. Kennedy and the Secret Cuban Missile Crisis Meetings*,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的《总统记录：约翰·肯尼迪》，其中 2 卷内容涉及古巴导弹危机的会议和会谈记录。^①美国中央情报局情报研究中心于 1992 年 10 月举行了首次有关导弹危机期间美国情报工作的学术研讨会，并且解密了一百多份有关文件。在苏联方面，20 世纪 80 年代末以来，陆续公开了外交部、国防部的一些档案文件。但与美国相比，其档案的解密很不系统，数量也要少得多。

数据库及网络资源的使用越来越普遍，人们研究的资料来源更为多元化。美国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的冷战国际史研究项目、研究公报和论文等都可以在网络上找到，里面包含了不少有关古巴导弹危机的宝贵资料，而且大部分资料都是从俄文翻译而来，具有较高的文献价值。^②汤姆森公司的“档案解密参考系统”（Declassified Documents Reference System，简称 DDRS）包含了大量相关原始文件。设在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的“国家安全档案馆”是一个专门收集冷战时期美国政府文献的专业档案馆，关于古巴导弹危机的文献资料可通过“数字国家安全档案馆”（Digital National Security Archive）数据库进行检索。^③这两个数据库是研究冷战史特别是有关美国外交政策重要的原始文献来源。美国国务院、中央情报局、肯尼迪总统图书馆、国家档案馆等网站也都有不少相关研究资料。^④

第三，国际交流和合作研究更加频繁。古巴导弹危机是冷战史上惊心动魄的一幕。随着冷战的结束，苏联、美国、古巴的学者、当事人可以坐在一起，共同回顾、探讨这一对人类历史产生重大影响的历史事件，并从中汲取经验教训。1987 年 3 月，由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主办的第一次有关古巴导弹危机的讨论会在佛罗里达的霍克岛举行，参加这次会议的均为美国学者和肯尼迪时期的政府官员，包括麦克纳马拉、邦迪、狄龙、索伦森等。同年 10 月，在哈佛大学科学与国际事务研究中心举行了续会，苏联学者第一次参加了会议，他们虽然不是危机的直接参与者，但也提供了不少有关苏联决策情况的新信息。1989 年 1 月，苏联科学院在莫斯科举行了第三次关于古巴导弹危机的国际讨论会，葛罗米柯、多勃雷宁、阿列克谢耶夫、鲍尔沙科夫等 20 位苏联政府官员和学者参加了讨论，6 名古巴前政府官员和学者也首次参加了会议，并且承诺在古巴举办同样的会议。美方与会人员包括麦克纳马拉、邦迪、索伦森等 12 人。当时美苏

^① Timothy Naftali and Philip Zelikow, *The Presidential Recordings: John F. Kennedy*, Vol. 2, New York: W. W. Norton & Company, 2001; Philip Zelikow and Ernest May, *The Presidential Recordings: John F. Kennedy*, Vol. 3, New York: W. W. Norton & Company, 2001.

^② 网址为 <http://wilsoncenter.org>.

^③ 国家安全档案馆网址为 <http://www.gwu.edu/~nsarchiv>.

^④ 美国国务院网址 <http://www.state.gov>; 中央情报局 <http://www.cia.gov>; 肯尼迪总统图书馆 <http://www.jfklibrary.org>; 国家档案馆 <http://www.archives.gov>.

两国的最高领导人都致函研讨会，预祝会议圆满成功。经过 1991 年 1 月在安提瓜举行的预备会议，1992 年 1 月在哈瓦那正式召开了又一次关于古巴导弹危机的大型国际研讨会。卡斯特罗参加了整个为期三天的会议，就一些重大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和解释。与会者包括了美苏古三方面的危机参与者和相关研究者。苏联方面有 9 人与会，代表团团长是曾任赫鲁晓夫外交政策顾问的特罗扬诺夫斯基。哈瓦那会议对于古巴在危机期间所扮演的角色给予了更多关注，这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先前忽视古巴在其中所起作用的做法，使得人们对古巴导弹危机的认识更为全面。^①美国政治学者布莱特、威尔奇等将三次重要会议的发言记录整理出版，并由此形成了关于古巴导弹危机研究的“批评性口述史学”(Critical Oral History)。^②起初，由于缺乏必要的档案文献作为支持，人们对苏联学者发言的可信性还曾一度展开了争论。^③2002 年 10 月 11 日至 13 日，由古巴政府主办、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国家安全档案馆资助的古巴导弹危机讨论会在哈瓦那举行，来自美国、俄罗斯以及古巴的学者和政府官员与会，这也是进入新世纪以来召开的第一次大型的相关研讨会。这一系列国际研讨会的召开，极大地促进了人们对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的认识，也有助于美国、俄罗斯和古巴学者加强学术交流，增进相互了解。

近年来，中国学者也开始对这一重大历史事件进行研究，并取得了初步成果。发表的主要论文有张小明：《古巴导弹危机的再认识》，《世界历史》1996 年第 5 期；韩洪文：《美国对古巴导弹危机的初步反应》，《军事历史》1997 年第 5 期；柳植：《一场惊心动魄的核对抗：美苏解密档案展示的古巴导弹危机》，《百年潮》2000 年第 3 期；郝承敦：《古巴导弹危机新论：关于赫鲁晓夫决策动机及结局的分析》，《拉丁美洲研究》2002 年第 2 期；于江欣：《古巴导弹危机及其影响》，《军事历史》2004 年第 4 期；吴文成、梁占军：《古巴导弹危机中的官僚位置与决

^① Raymond Garthoff, "The Havana Conference on the Cuban Missile Crisis," *Cold War International History Project Bulletin*, Spring 1992, pp.2 - 3.

^② James G. Blight and David Welch, *On the Brink: Americans and Soviets Re-examine the Cuban Missile Crisis*, New York: Hill and Wang, 1989; Bruce Allyn, James G. Blight and David Welch, *Back to the Brink: Proceedings of the Moscow Conference on the Cuban Missile Crisis*, Lanham, MD: University Press of America, 1992; James G. Blight, Bruce Allyn and David Welch, *Cuba on the Brink: Castro, the Missile Crisis, and the Soviet Collapse*, New York: Pantheon Books, 1993; James G. Blight and Janet Lang, "Burden of Nuclear Responsibility: Reflections on the Critical Oral History of the Cuban Missile Crisis," *Peace and Conflict*, Vol.1, No.3, 1995, pp.225 - 264.

^③ Mark Kramer, Bruce J. Allyn, James G. Blight and David A. Welch, "Remembering the Cuban Missile Crisis: Should We Swallow Oral History?"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15, No.1, Summer 1990, pp.212 - 218.

策》,《国际政治科学》2006年第4期。出版的主要相关著作有李德福的《千钧一发:古巴导弹危机纪实》(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7年),朱明权主编的《20世纪60年代国际关系》(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杨存堂编著的《美苏冷战的一次极限:加勒比海导弹危机》(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此外,资中筠先生主编的《战后美国外交史》、王绳祖先生主编的《国际关系史》第九卷、刘金质先生的《冷战史》等也都有专章论述。目前国内有两篇相关博士学位论文,即东北师范大学历史学院王伟的《美国对古巴遏制政策的起源》(2004年)和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郑伟的《论国际危机管理中的信息沟通:以古巴导弹危机为例》(2005年)。特别值得指出的是,沈志华教授主编的《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29卷收录了有关古巴导弹危机的149份文件,绝大部分是首次在国内向读者介绍,是研究危机时期苏联政府活动的重要文献。^①另外,目前北京大学、东北师范大学、华东师范大学等单位已经购买了“档案解密参考系统”数据库。美国教育交流中心也有该数据库和“数字国家安全档案”数据库,供学者们免费使用。所有这些,都为中国学者研究这一冷战时期的重要事件提供了极大的便利条件。

毫无疑问,作为国际关系史上的一个重要事件,古巴导弹危机一直是国内史学界关注的对象。尽管国内出版的国际关系史和冷战史的著作比较多,其中不少涉及这一重大历史事件,但还没有专门的研究著作问世。笔者自2000年以来开始陆续收集这一方面的资料,并发表了几篇相关论文。2006年8月正式进入写作阶段。在收集资料和写作过程中得到了学界诸多师友的大力帮助、支持和鼓励,沈志华教授、崔丕教授、徐蓝教授、牛军教授、李丹慧教授、李剑鸣教授、王晓德教授等给予了多方指点、鼓励和帮助,南开大学历史学院院长陈志强教授和世界近现代史研究中心主任杨栋梁教授也一直非常关心笔者的研究进展情况。2008年3月,笔者有幸成为南京大学—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访问学者,这也是笔者在1998年之后第二次到南京大学中美文化研究中心进行短期研究。中美文化研究中心黄成凤主任、杨凯里(Jan Kiely)主任、蔡佳禾教授为笔者的研究工作提供了良好的环境。在中心与任东来教授、华涛教授的多次交谈也使笔者获益良多。利用中美文化研究中心丰富的图书资料,笔者得以完成了书稿的最后写作和修改。帮助提供文献资料的师友就更多了,包括美国长岛大学的夏亚峰博士;浙江大学历史系刘国柱教授;华东师范大学国际冷战史研究中心戴超武教授、周娜、梁志博士;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刘远政;南开大学图书馆苏东、王刚和历史学院资料中心主任侯咏梅等老师;南开大

^① 沈志华主编:《苏联历史档案选编》,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

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韩召颖博士、历史学院付成双博士和博士生李昀等。笔者在此一并表示深深的谢意。天津人民出版社的张献忠编辑为本书的出版给予了大力支持和帮助，这是我们的第二次合作，每次合作都十分愉快。没有诸位师友的关照和热情帮助，本书是不可能完成的。尽管如此，由于自己水平、能力有限，再加上这一课题本身的复杂性和难度，书中肯定会有一些这样或那样的疏漏和错误，敬请诸位先生予以批评指教。

目 录

第一章 美古关系的恶化	(1)
一、古巴革命的胜利与美国的反应	(1)
二、冥王星计划	(19)
三、古巴问题与 1960 年美国总统大选	(31)
第二章 肯尼迪政府对古巴的敌视	(35)
一、猪湾入侵	(35)
二、猫鼬行动	(53)
三、孤立与封锁	(69)
第三章 赫鲁晓夫的冒险决定	(77)
一、苏联与古巴关系的加强	(77)
二、部署导弹的主要意图	(87)
三、苏联的决策过程	(101)
第四章 暴风雨前的宁静	(120)
一、“阿纳德尔行动”	(120)
二、严格的保密措施	(131)
三、迷惑美国	(137)
四、古巴问题与美国国内政治	(144)
第五章 危机的序幕	(155)
一、美国监视苏联的动向	(155)
二、对古巴的应急作战计划	(174)

三、加强秘密行动	(186)
四、土耳其导弹问题的由来	(192)
第六章 艰难的抉择	(198)
一、美国发现古巴的导弹	(198)
二、执委会对苏联意图的分析	(202)
三、美国人最初的反应	(210)
四、空袭还是封锁	(219)
五、欺骗与反欺骗	(233)
第七章 准备摊牌	(239)
一、肯尼迪决心已下	(239)
二、最终的决定	(247)
三、与国会磋商	(259)
四、进行外交准备	(261)
第八章 核战边缘	(267)
一、肯尼迪发表讲话	(267)
二、美国的外交活动	(270)
三、危机中的世界	(273)
四、美国的军事部署	(276)
五、肯尼迪的谨慎	(291)
六、苏联和古巴的反应	(295)
第九章 寻求脱身	(310)
一、加勒比海上的对峙	(310)
二、联合国的干预	(320)
三、以压力谋妥协	(323)
四、古巴的强硬态度	(333)
五、赫鲁晓夫的求和信	(336)

第十章 “黑色星期六”	(345)
一、赫鲁晓夫提高要价	(345)
二、局势开始失控	(351)
三、执委会商讨回信	(361)
四、美苏秘密交易	(370)
五、危机的初步解决	(376)
第十一章 危机余波	(385)
一、古巴的愤怒与赫鲁晓夫的辩解	(385)
二、美国兑现诺言	(390)
三、危机并未结束	(393)
四、古巴的要求与米高扬的艰难使命	(396)
五、轰炸机问题	(404)
六、关于美国不入侵古巴的保证	(418)
第十二章 回顾与思考	(422)
一、古巴导弹危机的根源	(422)
二、危机的教训	(424)
三、潜在的危险	(432)
四、危机的后果及影响	(440)
参考文献	(451)
英汉人名翻译对照表	(474)

第一章

美古关系的恶化

1959年1月菲德尔·卡斯特罗领导的古巴革命取得胜利后,采取了一系列较为激进的政治、经济革命措施,直接触动了美国垄断资本在古巴的经济利益,并向美国在拉美地区的霸主地位提出了挑战。美国政府对古巴新政权采取了政治上敌视、经济上封锁、外交上孤立的政策,试图将新生的革命政府扼杀在摇篮中,建立一个符合美国利益的政权。美古关系的恶化,特别是美国对古巴政策的强硬,是导致古巴与苏联接近的最重要因素。

一、古巴革命的胜利与美国的反应

古巴是加勒比海地区的一个岛国,面积11万多平方公里,1961年人口约700万,北部距离美国佛罗里达半岛南端只有90英里。这个岛国曾长期遭受西班牙的殖民统治,1898年美西战争后沦为美国的殖民地。1901年,美国又通过强加给古巴的“普拉特修正案”,取得了干预其内政和在关塔那摩湾建立海军基地的权利。此后,历届古巴政府都奉行亲美的政策,美国势力一直在古巴占绝对统治地位。

1940年,古巴建立了得到美国支持的巴蒂斯塔陆军上校为首的独裁政权。1944年总统任期满后巴蒂斯塔出走美国,1948年他重返古巴,准备参加1952年的总统竞选。大选前夕,巴蒂斯塔依靠军队的支持发动政变,推翻了民选合法政府,夺取了古巴政权。他向美国表示,新政府将尊重美国在古巴的利益,美国很快承认了这一亲美政府。为了维持其独裁统治,巴蒂斯塔完全听命于美国。

经济上,美国垄断资本控制了古巴的经济命脉。古巴的经济结构单一,极为脆弱。蔗糖在国民生产总值中占25%,在出口总值中占80%。美国的36家糖厂就占了古巴全国食糖生产的40%,而且古巴食糖的主要出口对象是美国,

美国食糖的 1/3 来自古巴。美国的垄断资本控制了古巴铁路、电话、海运、航运等公用事业的 80% 和采矿业的 90%、牧场的 90%、石油工业的几乎 100%、公用铁路的 50%。古巴的银行业务及食品业的相当一部分也由美国公司控制。1956 年，美国银行在古巴的分行存款占到了整个古巴银行储蓄的 1/4。美国还可以通过对进口古巴糖定额的增减对古巴施加影响，古巴的对外贸易几乎完全依赖美国。1959 年，古巴出口品的 74% 以上供应美国市场，进口品的 80% 来自美国。古巴全国土地总面积的 1/5 左右被美国公司所控制。1958 年，美国对古巴的投资高达 12 亿美元。美国垄断资本完全操纵着古巴经济命脉，古巴国家财政预算的 1/5 来自美国公司缴纳的税收。^①

政治上，美国则通过其驻哈瓦那大使对古巴实行控制。1960 年，时任美国驻古巴大使的厄尔·史密斯宣称：“美国驻古巴大使是这个岛国的第二号重要人物，有时甚至比总统本人还要重要。”^② 巴蒂斯塔为维持其独裁政权，采取了一系列反动措施，阻挠进行社会改革。他解散了议会，废除了带有资产阶级性质的宪法，制定反人民的《宪法条例》；宣布共产党为非法组织，禁止罢工和群众集会、结社。

军事上，美国不仅向古巴提供了大量军事援助和武器装备，而且派遣军事使团前往，帮助训练古巴军队。1958 年美国在哈瓦那的一个军事使团包括 11 名陆军军官、9 名海军军官和 11 名空军军官。中央情报局还帮助巴蒂斯塔建立了一支警察部队。

在对外关系方面，巴蒂斯塔是美国冷战政策的积极支持者。美国驻古巴使馆在给国务院的电报中明确写道：“古巴人基本上坚定地支持美国。巴蒂斯塔政府采取了果断的措施反对共产主义，与苏联集团的国家断绝了外交关系，对于美国采取的阻止共产主义在全世界蔓延的措施给予了支持。”美国驻古使馆认为，巴蒂斯塔政权在有关主要国际问题上都与美国保持了“极好的合作和团结”。^③

巴蒂斯塔独裁政权的这些措施招致了中下阶层群众的强烈不满和愤恨，革

^① Thomas G. Paterson, *Contesting Castro: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Triumph of the Cuban Revolutio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4, pp. 34 – 35; Leland L. Johnson, “U.S. Business Interests in Cuba and the Rise of Castro,” *World Politics*, Vol. 17, No. 3, April 1965, pp. 442 – 443.

^② Walter LaFeber, *America, Russia, and the Cold War, 1945 – 1992*, New York: McGraw – Hill, 1993, p. 208

^③ Morris H. Morley, *Imperial State and Revolution: The United States and Cuba, 1952 – 1986*,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7, p. 47.

命运动由此孕育产生。美国著名历史学家小阿瑟·施莱辛格在巴蒂斯塔执政时期曾多次访问过哈瓦那。他写道：“哈瓦那令我陶醉，但同时也使我感到震惊。这座可爱的城市已被糟蹋成为一个巨大的游乐场所和妓院，供来自迈阿密的美国商人在周末恣意欢乐。我的同胞们手挽着年龄不足 14 岁的古巴姑娘招摇过市，抛出几个铜子让人们在沟渠里彼此争夺。根据目击的这种状况，人们不禁要问：任何古巴人，除了憎恨之外，还能对美国有什么其他感情呢？”^①

1953 年 7 月 26 日，青年律师菲德尔·卡斯特罗领导 120 多名爱国青年对军事要塞蒙卡达兵营发动突袭。由于寡不敌众，结果遭到失败，卡斯特罗被囚禁，直到 1955 年 5 月获释出狱，而后流亡墨西哥并在那里建立起革命组织“7·26 运动”。1956 年 12 月 2 日，卡斯特罗率领 82 名流亡墨西哥的追随者，乘“格拉玛”号游艇在古巴海岸登陆，受挫后转入马埃斯特腊山区，展开了反对巴蒂斯塔政权的游击战争。经过两年的斗争，卡斯特罗终于赢得了最后的胜利。1958 年 12 月 31 日，卡斯特罗指挥的武装力量攻入首都哈瓦那，推翻了巴蒂斯塔独裁统治。1959 年 1 月 1 日，以卡斯特罗为首的古巴革命政府正式接管了政权，建立了以“7·26 运动”成员为核心的新政府，卡斯特罗任临时政府武装部队司令，同年 2 月任总理。

卡斯特罗领导的这场革命运动得到了古巴各个阶层的支持和拥护。虽然一些人认为这是农民起义，但事实上，起义者包括古巴社会的各个阶层，有学生、大学教师、中产阶级知识分子、农民、士兵和商人，他们以各种方式抵抗巴蒂斯塔的独裁统治。新成立的革命政权立即采取了一些措施，惩治腐败，将土地分给贫穷者，得到了民众的普遍支持。此时卡斯特罗本人并非共产党，虽然他的弟弟劳尔·卡斯特罗和他的主要顾问格瓦拉等都是共产党员。古巴革命胜利后，古巴领导人宣布古巴革命并非共产党领导。卡斯特罗不只一次表示，古巴革命政府是“没有专制和寡头的民主政府”，革命的意识形态是“人道主义”；他本人既非共产党，也与共产党没有任何联系；古巴不打算采取“苏联模式”，在美苏冷战中，他的心是“同西方在一起的”，并有兴趣寻求美国的经济援助。1959 年 1 月初，在回答媒体是否接受美国的技术援助时，卡斯特罗明确表示愿意接受一切援助。2 月，他又欢迎外国资本直接投资古巴工业。古巴外长劳尔·罗

^① 小阿瑟·施莱辛格：《一千天：约翰·菲·肯尼迪在白宫》，仲宜译，北京：三联书店，1981 年，第 97 页。